

上篇 高等教育史专题

近代欧洲大学起源探微

近代欧洲大学是直接从中世纪大学发展而来的，它继承了中世纪大学的许多特征，如管理体制、教学组织、学习课程、考试制度、学位等等。然而近代大学在许多方面又不同于中世纪的大学，中世纪大学享有自主决定和管理学校内部事务的权利，即大学自治，近代大学则更多地受国家或政府的控制和影响；中世纪大学盛行教会主义，大学由教会操纵，近代大学则盛行现世主义，大学成为完全世俗化的机构；中世纪大学是神学和古典学科的世袭领地，科学和技术学科难登大雅之堂，大学的主要职能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近代大学的主要标志是将自然科学引入课程之中，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研究的风气。可以说，正是因为采纳了科学和科学研究，近代大学才得以最终形成。

我国教育史界多将 1810 年德国开办的柏林大学看作是近代大学的滥觞，因为柏林大学首先确立了大学科学研究的职能。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和准确的。柏林大学是近代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而不是源头。在柏林大学之前 欧洲早已有日内瓦学院、莱顿大学、爱丁堡大学、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等名校，它们才是近代大学的先驱。从时间上看，日内瓦学院创办于 1558 年，正值宗教改革时期，因而我们可以判定，近代大学发源于宗教改革时期。

宗教改革是欧洲继文艺复兴后新兴资产阶级发动的一场反封建的斗争，其发起人是德国维滕贝格大学哲学和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其助手梅兰克吞在对旧大学进行改造的同时，建立了一些新大学，但这些大学注重的仍是神学与人文学科，新兴的自然科学没有立足之地，因而路德教的大学还称不上是近代大学。稍后于路德的法国人加尔文在瑞士领导了另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其激烈程度远胜于德国。在教育上，加尔文与梅兰克吞一样，要求宗教教义与人文学科相结合，但他给予自然科学以明确的地位，为近代大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1558 年，加尔文创办了日内瓦学院，由神学家贝札 (Theodore Beza) 任首任院长，主要目的是宣扬加尔文新教教义，培养教士、神学家和教师。课程设人文主义和宗教两类科目，包括古典文学、一般文雅科目、伦理学、诗歌、物理学和神学等。从领导体制来看，日内瓦学院完全处于城市地方行政官和地方议会的控制之下。该

校一开办就获得成功，第一年招收了几百名学生。日内瓦学院对后来荷兰的莱顿大学、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及北美殖民地的哈佛学院，均产生了影响。

莱顿大学建于 1575 年，为荷兰第一所国立大学。1578 年人文主义者利普西斯 (Justus Lipsius) 从鲁汶大学来到莱顿大学任教，使莱顿大学渐渐闻名于欧洲知识界，被称为“欧洲第一所新教大学”。初建时仿效日内瓦学院，17 世纪初已成为有国际影响的神学、自然科学和医学中心。1709 年 博尔希维 Herman Boerhaave 被任命为莱顿大学医学教授。此后不久，大学医学院赢得了欧洲最好的医学院的声誉，虽然他一生没有什么特别的重大发现，但他却被尊为“欧洲教育大师”。这主要是因为他对各门学科都具有广博的知识，除教课外，他自己动手做科学研究工作，极其重视临床实践课。他以其真才实学和名望，吸引了各国的学生。莱顿医学训练体制强调教学和研究的结合，提出学医科的学生在进行专业训练之前掌握基础科学的要求，强调在各门科学学科建立新大学教授职位的制度，强调借助于严格考试对大学生成绩的测定以及良好的研究设施，包括化学实验室、植物园、医院的临床教学等，这些都对当时的维也纳大学、哥廷根大学和爱丁堡大学产生了影响。

莱顿大学的物理学也是闻名的。1670 年佛尔德 (Burchard de Volder) 任物理专业教授，五年后创建了莱顿第一个物理实验室，他的学生和继承者在这所实验室

里完成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科学实验，博尔希维即是其中之一。与博尔希维同时代的物理学家格雷夫桑德 (W. J. S'Gravesande) 是欧洲大陆第一个将教学全部建立在牛顿发现上的大学教师，他依照牛顿的观点从事工作，十分细心地做实验，并用数学演算实验结果，他编写的物理学教科书被译成英文和法文，广为流传。直到 19 世纪初，人们仍在参阅他和他的合作者制作的仪器图。

由于荷兰共和国的衰落，莱顿大学在欧洲独一无二的地位受到其他大学的挑战。在 18 世纪第一个 25 年中，共有 1340 名德国人在莱顿学习，到第三个 25 年中只有 391 名德国留学生。这是因为耶拿大学、哈勒大学、莱比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兴盛后吸引了大批的德国学生。

英国是创办大学最早的欧洲国家之一，牛津、剑桥是中世纪大学的佼佼者。然而，从 17 世纪后到整个 18 世纪，英国大学落后于时代，与世隔绝，处于持续的衰退之中，工业革命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各类人才大多不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学被传统的保守势力所控制，学术空气十分沉闷，自然科学不受重视。然而，在与之毗邻的苏格兰却产生了以科学教学闻名于世的大学。有人发现，当英格兰现代科学在大学范围之外被培育时，苏格兰几乎所有卓越的科学家都是大学教授。^①

苏格兰大学是通过效仿莱顿大学而振兴的。1708 年，爱丁堡市镇会议批准了由苏格兰长老会牧师、爱丁堡大学校长卡斯塔雷斯 (W. Carstares) 提出的改革方案，废除了过时的大学董事制度，建立了新的大学教授

职位。这样便使教师从繁杂的学科中解脱出来，集中在他们感兴趣的研究领域，结果是使学科和教学更专门化了。拉丁文、希腊文、逻辑、自然哲学、数学、伦理学、医学等教授职位先后设立，为扩大学术研究的规模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爱丁堡之前，莱顿大学已实施了类似的变革，爱丁堡的改革与卡斯塔雷斯在荷兰的经历是分不开的。继爱丁堡之后，格拉斯哥大学于 1727 年 圣安德鲁斯大学于 1747 年，阿伯丁大学于 1754 年先后完成了此项革新。在 18 世纪中叶，许多同时代的人感到苏格兰大学在不列颠诸岛提供了最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在医学、科学和数学领域。许多天才的学者和科学家都与 18 世纪的苏格兰大学有关系，如亚当·斯密、斯图尔特 (Dugald Stewart) 哈奇森 (Francis Hutcheson) 和卡伦 (William Cullen) 等人，哈奇森是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也是将源于欧洲的启蒙思想引入苏格兰运动的关键人物。弗格森 (Adam Ferguson) 先在格拉斯哥 后在爱丁堡的演讲，开辟了社会关系研究的新领域，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社会学。他在爱丁堡的继任者斯图尔特是有广泛影响的苏格兰“常识”哲学学派的阐述者，该学派后来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上述这些学者最终发起了获得世界性影响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大学的成功也为所在城市赢得了作为知识中心的国际声誉。外国人将爱丁堡喻为“不列颠的雅典”。许多来自英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学生进入苏格兰大学，随后也吸引了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殖民地的学生，其中多数人进

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因而医学院为大学带来了特别的荣誉。

莱顿大学在鼎盛时期，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德国学生，因而莱顿体制对德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德国中世纪的大学，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16世纪时德国已有42所大学，是当时欧洲大学数量最多、最密集的国家。然而到17世纪末德国大学的声誉一落千丈，久负盛名的海德堡大学在1701~1705年间仅招收了80名学生。著名科学家莱布尼兹甚至以大学为耻辱，认为置身于这样的机构有损自己的尊严。然而18世纪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成功，使德国传统大学获得新生。

哈勒大学开办于1694年，它的振兴可归功于三个人的努力，其一是德国“启蒙运动之父”托马西乌斯（Christian Thomasius）他被称为“哈勒大学的第一位教师”和新大学学术的奠基人，他废弃了中世纪大学传下来的经院主义课程，使哲学脱离神学而独立；他最先采用德语讲学，打破了拉丁语在大学讲课中的垄断地位；他在教学中强调实际知识和现实生活，重视对生活有用的科学的运用，使大学教育更接近于生活。其二是虔敬派神学家弗兰克（A. H. Francke）他突破了盛行的神学正统观念，是德国大学最先讲授虔敬主义神学的人；他在哈勒创办了一系列的教育机构，注重培养具有虔敬信仰的和实际生活所必需的智能的基督教徒。其三是启蒙哲学大师沃尔夫（Christian Wolff）他被看作是创建现代哲学体系的第一人，这种现代哲学是以数学和自然

科学为基础的。史家认为，正是沃尔弗“帮助哈勒大学成为德国主要的近代大学”。^②由于最先倡导学术自由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哈勒大学被史家誉为“不仅是德国的而且是欧洲的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③

哈勒大学的成功，引起了其他大学的效仿。哥廷根大学既是效仿哈勒的产物，也是哈勒的竞争对手，它是由汉诺威政府开办并资助的，其创办人闵希豪生（Gerlack Adolf von Munchhausen）为枢密院主要官员，毕业于哈勒大学，因而其教育思想具有明显的哈勒特征。在长达 36 年中，他的影响涉及到大学的各个领域。他大大削弱了神学家在大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神学第一次丧失了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的特权；他通过增加哲学学科的分量表明自己对哲学院的重视，他尤其注重历史、语言和数学等学科；他建立了装备优良的科学实验室、天文台、解剖示范室、植物园、博物馆、大学医院等。在短短的时间里，哥廷根获得了极大的声誉，成为中欧主要的学术和科学中心之一，其医学院更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医学院之一。许多大学科学教授联合成立了著名的哥廷根城科学学会。德国教育史家鲍尔生说：“哥廷根大学不同于别校的优点，是该校使真正的科学研究受到大力的鼓励和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有经费充裕和设备富丽的图书馆，还有专门从事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的研究所。”^④由于哥廷根大学所取得的成就，有的学者认为哥廷根比哈勒更有资格享有欧洲“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头衔。

至此，近代大学的基本特征均已形成，如学术自由、注重研究的风气、自然科学纳入大学课程，以及政府对大学的资助和控制等等。

19 世纪初创办的柏林大学，几乎综合了近代大学的所有特征。其创办人洪堡来自哥廷根。他“创立大学所依据的精神和道德准则是其他人先期设想的”，他不过“是把早已形成的思想，把一般的趋势加以具体化来实现改革的”。^⑤总而言之，柏林大学反映了自宗教改革以来欧洲大学改革的总趋向，它是近代大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柏林大学的历史意义，我们要予以充分肯定，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日内瓦学院、莱顿大学、爱丁堡大学、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等近代先驱大学的开创和奠基之功。

注释：

①Willis Rudy,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 1100~1914*,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84, P. 87.

②Daniel Fallon, *The German University* . Coload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7.

弗·鲍尔生著 滕大春等译：《德国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79 页。

同 第 82 页。

⑤彼得·贝格拉著 袁杰译：《威廉·冯·洪堡传》 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 第 70 页。

高等教育的重大转折

——工业化时代欧洲大学的变革

欧洲是现代大学的发祥地，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传统大学在工业革命时代经历了根本的变革。教育史一般将大学的创办到工业革命前看作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一阶段，将工业革命到 20 世纪上半叶看作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本文叙述的正是第二阶段的前期，即工业化时代欧洲大学的发展，这是一个承前启后、意义非凡的时代。

西方教育学者指出：“大学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早期还处于一种休眠状态。缺少一种切实的、在知识上的职责，强调传授已有的文化，严格限制发挥社会作用，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动力上的不足。”^①然而正是从这时起，最早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浪潮开始冲刷欧洲大陆，并由此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古老的守旧的传统大学也面临着时代大潮的冲击。

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最早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工业革命始于 18 世纪 60 年代，完成于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早于其他欧洲国家。然而英

国并没有成为欧洲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领头羊，欧洲大学的巨大变革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开始的，法国和德国的大学率先开始经历了意义深远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和影响

大学自治是由中世纪延续下来的传统，大学享有自主决定和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后来，教会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再后来国家又加强了对大学的影响。法国大革命时代，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工业革命给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日益增长的要求，国家需要受过大学训练的人员服务于新的复杂的社会结构。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传统大学，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注重功利主义的专业学校和独立的文理学院。罗伯斯庇尔等大革命时期的领导人 对垂死的、由教会控制的、思想上反动的以及忽略现代科学和学术的传统大学深恶痛绝。1793年，革命政权废除了所有 22 所旧大学，没收了它们的财产，并酝酿创办新的专业学校。如国民公会曾拟开办一所高级中央公务学校（即后来著名的巴黎多科工艺学院），一所东方语言学校，一所训练教师的师范学校，等等。然而由于战争的原因，加上失控的通货膨胀，以及各政治派别的活动和匮乏的资金，使上述计

划大大延缓或成为一纸空文。直到拿破仑时代，这些蓝图才变成现实。

历史学者将拿破仑的制度看作是基督教会的思想控制、政府的官僚体制以及皇帝的军事作风相混合的产物。拿破仑建立第一帝国后，于 1808 年创办帝国大学以控制和管理全国的公共教育，包括所有独立的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理学院和文学院。拿破仑式的大学的目标是培养忠于君主的、忠于祖国和家庭的、为国家服务的公民。

法国大学制度是由一个强大的国家官僚体制集中控制高等教育的极端模式。名义上个人和私人组织有权办理学校，但由于国家垄断了学位授予权，实际上完全垄断了高等教育。政府要求教师绝对效忠，对胆敢批评政府的教师毫不留情。如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著名历史学教授米什莱（Jules Michelet）和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以及一名斯拉夫学者，因被控对当局不友好，均被开除出大学。

据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第二帝国时期一名教育部长曾拿出表并宣称：此刻在某班级里，帝国所有的学生正在学习维吉尔著作的某一页。该传说道出了当时法国教育高度集权的现实。拿破仑体制的机械性和官僚主义特征由此可见一斑。

在德国，各邦对大学的管理自宗教改革以来就开始了，19世纪以来，愈加明显和加强。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改革家、普鲁士教育部长洪堡既把大学看做是国家精

神的体现，又把大学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他主张自我实现和大学学者个人自由的观点。为此，他期望他创办的柏林大学应有独立的收入作为自治的保障。他还主张大学教授应有丰厚的工资，这样他们才能够摆脱经济烦恼而专注于实现增进知识的主要目标。然而洪堡之后的教育部长并没有继承他的观点 其中之一冯·舒克曼 (Friedrich von Schuckmann) 粗暴地否定了任何关于柏林大学财政自治的主张，声称决不允许大学成为“国中之国”。另一名部长冯·阿尔滕施泰因 (Karl von Altenstein) 公然宣称受雇的大学教授无权对政治事务发表独立的见解。事实上，后来柏林大学的实际预算远远低于最初政府所规定的标准，大学自治受到极大的限制。难怪有的史学家称 19 世纪的德国大学为“自我管理”的机构而非“自治”的机构 这是颇有道理的。在大学自我管理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极少数资历较老的教授，每年从他们当中选举大学官员——校长、系主任和大学评议会成员。然而，更大的实权操纵在教育部长手中。1819 年以后，政府在每所大学派驻了代理人，直接向部长报告。校长和系主任只有得到部长的批准才能就职。大学的管理严格地遵循部长的指示，教授、副教授的等级和任命、晋升和工资都由部长决定。大学惟一能够独立作出的决定是任命无薪讲师。

国家对大学的控制在奥匈帝国更加登峰造极。在梅特涅的高压统治下，1848 年之前的奥地利邦对所有学校实施了严密的控制。弗兰西斯皇帝 1821 年告诫莱

巴赫中学的教师说：我不需要雇员，而需要好的忠诚的公民。你们的任务就是将青年培养成这样的公民。服务于我的教师必须传授我指定传授的知识。在这种制度下，大学教授和文科中学教师受到严格控制，他们必须遵循规定的程序，使用国家批准的教科书，独立思想完全被禁止。

国家加强对高等教育控制和影响的后果是：一方面大学更加面向社会现实，服务于国家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的支持和管理，大学获得空前的发展。当然有时过分的干预也造成了消极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大学自由成长。

二、大学成为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思潮的中心

法国大革命在欧洲许多民族中唤起了新的民族团结一致的对美好的民族未来的向往。民族主义精神逐渐在大学传播，使大学最终成为民族复兴运动的指挥部，这与早期大学的国际性特征是迥异的。

19世纪初，德国大学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具有代表性的。1806年耶拿战争后，普鲁士屈从于拿破仑脚下，哈勒大学被查禁，德意志民族面临生死关头。在民族危亡之时，一场自由运动在大学兴起。

为了传播民族主义思想，要求创建新型的学生组织。号称“德国体操之父”的榭 (Friedrich Ludwig Jahn)

组织的青年体操协会应运而生。他们强调民族团结，不在乎社会地位的区别，会员都穿简朴的灰衬衣。然而不久，他们便表明了反犹太主义或反斯拉夫主义的倾向，他们甚至闯入大学讲坛，干扰所谓“反民族主义”的教授的讲课。1815年新的民族主义协会“青年协会”在耶拿大学创立，并逐渐在大多数大学出现。1817年10月，在爱森纳赫（Eisenach）附近举行的学生集会上，一批杨的追随者将一堆被认为是反民族主义者的作品付之一炬。1818年举行的青年协会会议，提议将学生协会的成员仅限于基督教徒和日耳曼人。经过长时间争论，通过一项决议，规定青年协会的目的是“通过为祖国服务的每种精神的和物质的力量，促进基督教——日耳曼的发展”。

1819年3月，大学生桑德（Karl Sand）刺杀了保守的作家柯茨毕（August von Kotzebue），该事件导致了政府对青年运动的镇压，青年协会遭禁，建立了遍及德国联盟的大学严密监督网，对所有学生的出版物和集会加强了审查。少数青年协会成员转入地下斗争。

大学也是激进主义的滋生地。许多学生既是民族主义者，也是激进主义者，他们要求自由化和社会革命，甚至组织推翻现政权的运动。当局逐渐认识到大学的激进主义比民族主义具有更大的威胁，遂不断加强镇压。

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大学常被革命当局视作反革命的潜在中心，自然没有激进主义因素。在梅特涅统治时

期，即拿破仑失败后的政治反动时代，激进主义在某些欧洲大学出现了，尤其是在专制主义盛行的国家，如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

法国巴黎多科工艺学院曾是激进学生的活动阵地。19世纪早期，孔德 Auguste Comte 和谢瓦利埃 Michel Chevalier) 都是该校的学生。在波旁王朝复辟和七月王朝阶段，因学生反对政府，学校至少被当局关闭了四次。在 1830 年和 1848 年的革命中，学生们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 19 世纪前半期，德国一些大学成为传播自由主义思想和革命思想的阵地。1837 年为抗议统治者废除汉诺威宪法的专横行径。哥廷根大学一些著名的学者拒绝向王室进行规定的效忠宣誓，结果有七人被开除。1848 年，当革命的风暴席卷欧洲时，进步学生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他们在迫使路德维希国王退位的慕尼黑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的柏林、黑森、吉森以及维也纳大学，都是进步学生运动的中心。然而，最终反动统治还是用刺刀恢复了专制主义，大学激进主义运动惨遭镇压。

三、现世主义逐渐战胜教会主义成为大学的主流

在 19 世纪前 欧洲大学由教会控制 宗教性十分突出。然而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日益壮大，宗教组织的权

力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这种不可抗拒的现世主义趋势与当时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19 世纪的欧洲大学成为现世主义和教会主义斗争的焦点。

在法国，罗马天主教会及其支持者极力反对拿破仑创办的世俗的国家控制的法兰西大学，教会发言人指责它是国家垄断的象征。王政复辟政府同情天主教的立场，但不敢完全否定拿破仑的制度。当局下令停止了一些信奉自由主义思想的教授的职务，并于 1822~1830 年查封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大学制度遭到了保皇主义极端分子的猛烈攻击。1850 年，教育部长法卢 (Comte de Falloux) 提出法卢法案，给予教士在管理公共教育时以较大的发言权。给予教会和私人自由建立中等学校的权利，但法卢仍将高等教育单独留给法兰西大学控制。在君主主义的影响下，法国议会 1875 年 7 月通过法案 建立“完全自由的高等教育”目的是使天主教创办自己的高等学校。教会很快在巴黎、里尔、昂热、里昂和图卢兹开办了大学，但当 1880 年共和派和反教会主义者恢复政权后，收回了新的教会大学授予学位的权力，仍交法兰西大学独揽。

现世主义在 19 世纪的英国也经历了逐渐发展的过程。自王政复辟以来，牛津、剑桥两校向一半的英国人关闭，基本上只是训练国教会牧师的机构。在牛津，不赞成英国教会三十九条信纲者被禁止入学，在剑桥则不能获得学位或奖学金以及研究员职位。1834 年，议会

讨论一项取消上述限制的法案，遭到教会反对，圣公会发言人指责这是对宗教的攻击。法案虽获下院通过，却遭上院否决。

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酝酿成立一所世俗化的大学以打破牛桥（牛津、剑桥大学的简称）一统天下的局面。诗人坎贝尔（Thomas Campbell）1820年赴德访问后，倡议在伦敦开设一所新大学，立即得到反托利党人、自由的非国教徒和现世主义者联盟的支持，一些著名人士也起而响应，如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边沁、穆勒和布鲁厄姆（Lord Brougham）等人。虽然受到教会及其支持者和旧大学的维持者的强烈反对，伦敦大学学院仍于1828年开学，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所完全世俗化的高等教育机构。学院毫无限制地招收非国教徒甚至自由思想者入学，课程强调科学、历史和其他完全世俗的学科。不久，圣公会创办国王学院以同大学学院竞争。1836年经协议两校合并为伦敦大学，并获得举办证书考试和授予学位的权利。1850年，伦敦大学被授权合并其他学院，规模逐渐扩大。1858年又被授权组织考试，以使通过考试的校外人士也能获得学位。在伦敦大学的影响下，从19世纪中叶开始，新的地方性的世俗学院在英国纷纷出现。

在这种形势下，牛桥被迫改制。1850年政府组成两个皇家委员会对大学进行调查，最终建议废除宗教测验。1871年，牛桥终于取消了入学所要求的宗教测验。